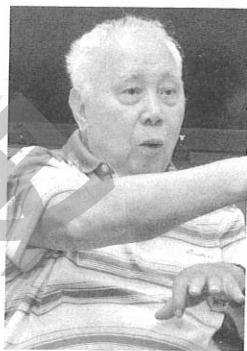


抗战生涯 辉煌年华^①

讲述者

吕胜（1928—），广东中山海洲人。1944年7月参加游击队，同年9月入党，1944年7月至1945年5月在梁伯雄大队任副班长、小队长，1945年5月至1949年10月任中山三区地下党西海武工队队长、三区区委委员，1949年10月至1976年10月任三区组织委员、区中队长，县委组织部干事，小榄镇委书记、镇长，县委工业部长，中山县委副书记，石岐镇镇长、书记，县生产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1976年10月至1984年10月任中山糖厂副书记、书记，1984年10月至1989年3月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1989年4月离休。



吕胜

少年便有报国志

我是中山市古镇海洲乡人，在海洲小学读书。海洲乡长袁世根是小学的校长。小学毕业后，我留读夜校，继续学习培训。在此期间，我看了许多进步书籍。在日伪政府统治下，很多进步书籍都被禁了。袁世根校长通过香港，转运了一些进步书籍回来。这些书籍主要是讲延安、讲抗日的。接触这些书籍后，我的思想进步比较快。16岁的我立志要保家卫国。

^① 根据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2014年6月20日采访吕胜整理。采访者谢长贵、林伟桦、漆雄鹰、梁智昌；梁智昌整理。采访地点为中山市老干局。

海洲小学有一个进步老师，叫李文球，是一名共产党员。1944年，我向他提出要参加抗日部队。参加部队的事，我开始不敢告诉家人。一方面，我当时还小，参军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另一方面，俗语说“好仔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兵，在当时社会是一件不光彩的事。然而，我保家卫国的信念并没有因此动摇，趁着母亲和姐姐去耕田劳作的机会，留了一封信，就离家了。我在信中对家人撒了个谎：“有朋友介绍我工作，但还不知道要去哪里，不知道什么工作。日后我再给你们写信，把事情说清楚。”就这样，我毅然参加了部队。

参加的部队是九区的梁伯雄大队。这是一支“白皮红心”部队，挂国民党的招牌，却由共产党实际领导。该大队辖七、八、九三个中队，其中第九中队是主力中队。我加入的就是第九中队。因为我是主动要求参加部队，并且有小学文化，而同期参加部队的同志文化水平偏低，所以在部队中，我算得上是小知识分子。同年7月，我由副中队长梁冠介绍入党，当时才16岁。现在规定18岁才能入党，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规定。

不畏艰苦、联系群众的部队生活

部队的的生活很艰苦。譬如，部队中没有专门的炊事员，每个人轮流煮饭。由于物资紧缺，很多时候都是盐水捞饭，而且经常不够吃，能吃到鱼、豆腐就很好了。平时很难吃到肉，只有在打胜仗之后，才能宰猪吃。

尽管生活如此艰苦，我们仍学会了苦中作乐。有个战友叫梁荣，每次用鱼骨喂狗时，都会对着狗说：“汪精卫、汪精卫”。狗就摇头摆尾地走过来舔骨头。梁荣就对大家说：“看看汪精卫多馋嘴”，引得大家发笑。战士们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能够坚持下来，并且取得革命的胜利，都是因为我们共产党的士兵都有信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部队对战士的要求很严格。入伍之前，每个人要接受教育，只有有了一定的思想觉悟，得到组织同意，才能加入队伍。这就从源头上保证了队伍的质量，使党的政策能够得到最忠实的执行。

另一方面，共产党的部队与群众联系相当密切。部队每到一个地方，班长、副班长都会带队深入基层，做群众工作。一方面掌握当地情况，另一方面了解群众对抗日的想法。过去，村民们开会的时候，地方的土匪恶

霸都出来捣乱；后来，我们部队派人参加，既听取群众意见，同时也有利于会议的顺利进行。通过这些细节，群众了解到我们部队作风与其他部队不一样，是真正的抗日队伍，纷纷支持拥护我们。

沙栏战斗：首次出击取得开门红

1944年10月，部队决定攻打沙栏。沙栏在今天的中山市三角镇，当时那一带驻有一个伪军中队。这个中队硬件好，人数多、装备优，但许多是雇佣兵，缺乏战斗信念，因此战斗力并不强。战前的侦察工作由我负责。敌人的营房三间开，中间是大房，两边是小房，营房前还有一条河。中间的房子是给普通士兵休息，两边的房子则是给中队级、小队级的伪军干部休息。另外，我还了解到敌人有机枪，就在两侧的房间。我把情报及时向部队领导汇报。根据实际，部队决定采取夜袭的方式攻打沙栏。

我方由于武器紧缺，只有小队级，或者是突击队才能使用短枪。而普通战士则使用长枪。长枪比人还高，我们戏称其为“绑崩鼻”。我当时入伍不算久，但由于是党员，要冲锋在前，所以被分入了突击队，改用短枪。在之前的训练中，我没有练过短枪，所以要尽快地摸透练熟，尤其是在夜间换子弹。

战斗开始的时间是凌晨1点多。首先攻打敌方两侧的干部房间。当我们靠近的时候，发现营地有3挺机枪，其中一挺对着河涌，另外两挺对着哨岗。主力突击队从后面摸上敌人的哨岗，解决了哨兵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去。敌人还来不及反应，我们已喊“缴枪不杀、缴枪不杀”。河涌对岸也响起这种喊声，形成一种铺天盖地之势，震慑住敌人，几分钟内就解决了战斗。尽管比较顺利，我们仍出现了人员伤亡。战友梁荣被敌中队长枪击，肠子外流。虽然经卫生员及时抢救，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器械和药品，不幸牺牲了。这是我们在此次战斗中牺牲的唯一一名同志。

战斗结束后，我们集中俘虏，宣传抗日方针：愿意共同抗日的，可以跟我们走；不愿意抗日、想回乡的，我们发一些盘缠，让他们回家。当时有4个人愿意加入我们部队，其他人则给了一点路费，离开了。此次战斗，缴获了1挺日本轻机枪和30多支步枪。步枪都是由广州石井兵工厂制造的。这些武器极大增强了我们的战斗力。

收拾战利品后我跟着部队马上回防。为了防止敌人跟踪和袭击，我们的出发地和回防地必须不同，出发地是牛角，回防地则是南头。归程中，突然间听到“蹦”的一声巨响，我们起初以为有敌人进攻，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后来才知道是缴获的枪支中，部分上了膛。我们没有验枪，直接背着走。途中有同志不小心触碰。枪走了火。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战斗的险恶。敌人很警惕：备着枪睡觉，枪还上了膛。

捷报连连

沙栏战斗是我的首次战斗，使我的革命生涯取得了开门红。之后在部队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屡次参加战斗，均捷报频传。

伏击日本兵。当时我们在孖沙驻防。哨兵回来报告，驻守江门的股日军，开着一艘电船巡逻，并在孖沙一带登陆。副政委郑文马上布防，在孖沙的一条三盆水道附近架设了一挺机枪，调动一个班驻防。战士们发现日军后，马上开枪。连发的机枪瞬间打死了3个日军。日军散开后准备反击。考虑到敌我差距，郑文同志马上命令我们往黄圃方向撤退。本次伏击日本兵，我方没有任何损失，而日军则抬着3具尸体狼狈离开。

“汉奸筹款”。战争期间，我们的物资供给不足。虽然部队已经发展到上百人，但上级给我们的仍然是30人的物资。尽管不断节省开支，物资供应仍然不够。我们驻地一带，有一个大汉奸，是顺德糖厂的厂长。他家附近养了很多猪。于是，我们决定向他“募捐”猪、糖等物资。这就是“汉奸筹款”。抓猪的时候，我们用石灰洒在猪眼上，然后再用一个大的麻布袋把猪套起来。汉奸家附近有伪军，驻扎在炮台上。虽然伪军知道我们的行动，但他们没有袭击我们。因为我们所“募捐”的物资是汉奸的，不是他们的。这也反映了汉奸与伪军之间关系的虚伪。

攻打黄礼。黄礼是南头一带伪军的大队长。当时我方有一个同志与黄礼部队有一点联系。我们就安排他到黄礼部队做内应，并约定墟日交换情报，如晚上什么时候由他放哨等等。后来在内应同志放哨的时候进攻，内外夹击，打了一个胜仗，但让伪军头子黄礼逃跑了。

转入地下，伺机待发

1945年年初，珠江纵队成立，成为珠江三角洲敌后抗战的重要力量。其中，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梁伯雄大队驻扎在中山九区，即今天的黄圃一带。敌伪及国民党顽固派将孤悬敌后的梁伯雄大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决意要消灭我们。1945年5月23日，即农历4月12日，伪军调动了几个支队共3000余人来攻打我们。当时，梁伯雄大队只有几百人。双方实力差距悬殊。战斗中，梁伯雄大队受到重创，伤亡巨大，大队长梁伯雄、政委郑文均不幸牺牲。我经历了这场战斗。

当时，我已经担任副小队长，驻扎在将军庙。通过潜藏在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我们获悉敌人要在5月23日进攻。当天凌晨3、4点，我们就吃完早饭，然后布防。将军庙附近有一条河涌，上面架有一条三驳桥。我们把桥拆了，同时在主要的路口上架起了机枪，还把蚬壳倒在地上，使敌人的冲锋没有那么顺畅。

天未亮，敌人就进攻了。来到将军庙，因为桥梁被拆而无法过河，部分敌人爬上岸边的寮屋，居高临下，开枪打伤了我们的战士。小队长梁荣桂马上端起一支枪，登上将军庙屋顶，打了一枪，把敌人打下去。小队长得意地问：“打得好不好？”我们都说：“好啊！”然后，小队长对着对岸喊：“再上来啊！给多一枪！”敌人果然又爬上了另一间茅屋。小队长又给了一枪，又把敌人打下去了，又得意地问：“打得好不好？”我们都说：“好啊！”我们这条防线，始终没有被敌人突破。但是，敌人从其他路线攻了进来，还大放厥词：“不打死梁伯雄，不收队。”

与敌人相比，我们不仅人数少，而且武器装备也不足，傍晚时分还下起了雨，我们自制的土炸药难以发挥作用。以上种种情况，使我们处于不利境地。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小队长就宣布，由于寡不敌众，为了减免不必要的牺牲，队伍暂时解散。我们把武器集中起来，沉到鱼塘里，同志们暂时隐蔽起来。

队伍解散后，我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了新会。之后，我一直在新会从事地下工作，没有转回部队。稍后我调回中山。因为有部队经历，被安排负责武装斗争。再稍后，我参与建立西海武工队，并任队长，直至新中国成立。

【延伸阅读】

梁伯雄大队抗击顽军的英勇斗争

梁伯雄大队是活跃在中山九区大沙田的最早的抗日武装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和五桂山部队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部队发展很快。1938年底建立小队，1939年已发展成为200余人的大队（对外仍挂“挺三”第三大队。到1944年1月，在其大队属下之第二中队内部宣布成立九区大队，下辖3个中队，对外的称呼不变）。梁伯雄大队从建队开始一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伍分别驻在牛角、中沙、坡头、孖沙等地，进行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打击反动势力的斗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梁伯雄大队也因此成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心腹大患。1945年春，日、伪、顽秘密策划了“五·九扫荡”，密谋趁“扫荡”五桂山抗日根据地之机，袭击我九区梁伯雄大队。

早在1944年冬，五桂山部队已从情报中意识到国民党顽固派将要发动围攻梁伯雄部队的企图。珠纵第一支队为此专门作过一些应变的准备，调派郑永晖到屈仁则、梁自带处开展统战工作。珠纵司令部也非常关心这支孤悬在“挺三”腹地的队伍之安危。林鏞云、谢斌及梁奇达、杨子江先后到过九区部队，反复分析情况，研究应变对策。但由于当时九区社会情况相当复杂，头绪纷繁，在地理位置上又是五桂山区通往南、番、顺以至中区、西江的交通要道，保住这个地区对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十分重要，因此，梁伯雄大队仍坚守九区驻地。1945年初，日、伪、顽“扫荡”前夕，形势已非常严峻，部队党委指示梁伯雄大队要做好抗击敌人、保卫九区的准备工作。同时根据反“扫荡”部署，指示梁伯雄大队坚守九区，牵制敌人兵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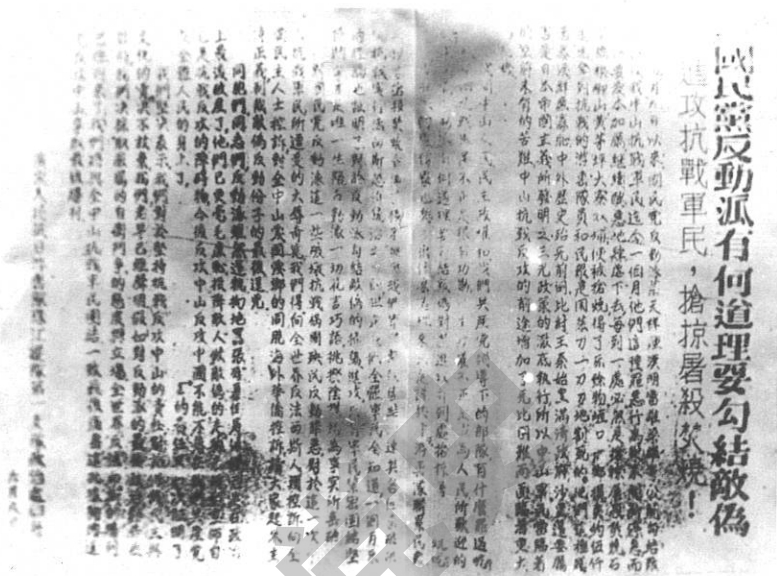
梁伯雄大队接到情况通报和上级指示后，进行了战前动员。同时抓紧军事训练，提高战斗素质，并与五桂山部队共同商定了严阵以待的应变措施，密切监视敌人行动，全体指战员实行轻装，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1945年5月12日，“挺三”司令伍藩在三区鸡笼乡召开反共内战联合会议。所属五个支队的头目均到会。会议决定联合进攻梁伯雄大队。5

月18日正式下达围攻梁伯雄大队的密令：由潘惠、梁正、梁自带、谢云龙等纠集3000余人，分四路进行围攻。第一路从南头向坡头、孖沙一带进攻；第二路向牛角、中沙一带进攻；第三路向永益、小沥尾、四埗涌口一带进攻；第四路由各支队留守部队设防于各河涌沿岸准备截击。各路兵力在22日前布防就绪，23日上午8时同时行动。

5月23日（农历4月12日）拂晓，“挺三”按预定的阴谋，四路兵力一起出动，分别向九区大队驻地发起进攻。面临敌人的重兵压境，九区大队全体指战员毫无惧色，奋起还击，坚决抗击来犯之敌。中队长梁冠率领第二中队战士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终因弹药无法补充不得被迫撤出阵地；副政委郑文带领一个中队与敌激战至下午3时，阵地仍屹立不动。24日，“挺三”增加大批兵力，继续对梁伯雄大队发动猛烈进攻，形势万分危急。为了保存力量，大队政委蔡雄、副政委郑文等负责同志率领队伍边打边撤，冲出重围，转战到江边的九顷；撤到坡头、孖沙的队伍也于当日转移到九顷会合。由于敌人紧追不舍，梁伯雄大队与国民党顽军在九顷围展开激烈的战斗。战士们视死如归，坚守阵地，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激战一直持续到26日上午。由于部队四面受敌，连续作战，伤亡十分严重。加之弹药耗尽无法补充，撤退出路被敌人切断，五桂山部队又不能及时赶到增援，致使梁伯雄大队受到重创。全大队除少数人突出重围外，大队长梁伯雄在指挥战斗中壮烈阵亡，20多人英勇牺牲，50多人被俘，副政委郑文不幸被捕遭杀害，九区一带来不及转移的抗日干部、革命群众、共产党员及军人家属均遭毒手。国民党顽固派围攻抗日部队，一手制造了这起血案，中山人民闻之无不痛心疾首。

梁伯雄大队是一支抗日的队伍。成立6年多，在中山抗日战场上屡立战功，为党的武装建设、统一战线工作、支援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伪票、伪税的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事件发生后，《抗战报》随即撰文悼念梁伯雄，痛斥反动派。文中指出：“梁伯雄大队是爱人民、抗日最坚决的部队，便招致反动派的仇恨，要消灭之而后快。社会人士听闻此一噩耗，无不发指。国民党反动派这种唯恐帮助敌人不足，梦想将一切真正抗日力量消灭而后快的内战罪恶行径，只有更加在人民面前暴露其丑恶面目，成为千古罪人。而‘挺三’各支队在抗日最后胜利到来、国内民主势



《国民党反动派有何道理要勾结敌伪进攻抗战军民、抢掠屠杀焚烧!》

力必然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必然崩溃之前夕，竟不明大势，眼光如豆，受反动派所惑，走上反人民、打内战的道路，将亦必难逃人民的制裁。”

随后，珠纵一支队围绕国民党反动派进攻梁伯雄大队事件，又接连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中山县顽固派破坏抗日，已完全蜕变为反人民的反动派的事实。并向全县印发了《国民党反动派有何道理要勾结敌伪进攻抗战军民、抢掠屠杀焚烧!》的传单，严正指出：“他们已更毫无廉耻，投降敌人，做敌人的走狗，已明白宣布自己是抗日的障碍物。”《抗战报》也连续报道了国民党部队参加“五·九扫荡”，在石莹桥、槟榔山、黄茅坪、大寮、崧埔等地烧、杀、抢、掠的罪恶行径，并发表了题为《论反动派投降日寇打内战》的社论，号召“全体军民紧密团结起来，以我们铁的革命意志与力量，制裁国民党反动派投敌、内战，挽救中山抗战局面的危机，挽救人民灾难，配合盟军反攻，把敌人赶出中山”。

(摘自《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史》，中共中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编，1992年。)